



Kritische Verhältnisse:
Die Rezeption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China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

〔德〕阿梅龙 〔德〕狄安涅 刘森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 / (德) 阿梅龙, (德) 狄安涅, 刘森林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97 - 2194 - 0

I. ①法… II. ①阿… ②狄… ③刘… III. ①法兰克福学派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B08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3824 号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

主 编 / [德] 阿梅龙 [德] 狄安涅 刘森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王琛琦 范 迎
责任校对 / 丁爱兵 白桂和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85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194 - 0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德] 霍耐特 (Axel Honneth)*

对于我们今天召开的这次会议，阿多诺如泉下有知，也许会茫然而不知所云。不仅会议的主题，就连与会人员的组成或许都会让他大为疑惑：与会者来自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地域，而这个地域又是阿多诺在其哲学和美学思考中从未涉及过的。这个地域的代表何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去研究他的理论在这个国度的影响和被接受情况？

黑格尔曾说：“中国从未有过历史。”而阿多诺所持观点与这一说法也并无多大出入。就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核心人物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是十分欧洲化的，确切说是灌注着欧洲中心主义视野的体系：他有关文明发展的阐述不假思索地与欧洲历史联结在一起——从远古的希腊城邦开始，经由中世纪惩罚巫婆的火刑和十字军东征，最后解析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暴行。此间，埃及和亚洲地区并未被顾及，美洲的殖民化过程也未被提及，至于非洲方面更是只字未提，整个世界历史往往被欧洲历史的那一

* 该文系霍耐特于2008年9月25日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辞。原文标题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亚洲的接受史及影响”，现标题系译者所定。



小部分来权衡。如此用以阐释文明史的方式也同样体现在对理论的运用以及美学关联性的构建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提及的只是欧洲或德国思想家们的理论，也就是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以及不断被论及的弗洛伊德。在阐述文学、音乐和绘画中的审美感知时触及的也局限于欧洲内部，连东欧邻国或美国的情况也只是被用疑虑的眼光审视着。

当然，我这样说只是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而言，而在其外围却无疑有一些对欧洲以外的事件、态势和发展投以较大关注的学者：在本雅明那里总是会有一些昭示出对自身眼界的空间局限表示某种疑虑的反省；20世纪20年代末，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弗戈尔致力于将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立发展类型来研究；而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脱离关系后的弗洛姆不久便开始了对墨西哥和西方国家早期单纯的社会化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外围出现的所有这些将理论视野拓宽到欧洲之外的趋势却丝毫不能改变这个普遍的，并已经沉淀下来的理论方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直到学生运动时期在三重意义上都是一种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说：只是指向欧洲的历史进程；只是以欧洲思想家为依托并将作为世界一部分的欧洲看成世界的全部。

随着大学生运动的兴起，非欧洲国家进入了理论思考的视野，当哈贝马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对批判理论进行重新构建时，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视角显然狭窄的传统才被打破。交往行为理论不仅试图在理论渊源上，而且也试图在理论与社会的关联域问题上，从对欧洲现实的唯一依附中解脱出来。如今，在构建核心概念时，一些非欧洲国家的著作也被顾及，而范畴框架也被界定得很抽象，以使之也能适用于其他历史发展进程。总体上，人们已越来越注意到自己的学说可能带有的局限性。随着哈贝马斯的转型努力，批判理论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对于自己所阐释和陈述内容的普遍性开始越来越感到怀疑。虽然它还没有全方位地去考察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路径的可能，但是它正处于一个绝佳的状态中：在理论思考的一开始就顾及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事实。如今，批判理论面临的重要问题无疑是，必须把亚洲、东欧、西欧以及南美洲不同现代化进程这个事实考虑在内。即便批判理论继续遵循它本来的目标，即在揭示现代

化进程中的各种极端理性化和“社会病理”时，它也应该看到，这些将理性推向极致的做法和出现的社会病症也是与不同文化条件、政治体系和经济形式息息相关的。

看一下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会特别惊讶地发现，大多来自中国的同事并没有关注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而是关注着批判理论在社会研究所成立和流亡时期的一些代表，如本雅明、霍克海默尔、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的著作。此间，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个例外。这些关注探讨的问题是，这些人的思想在亚洲地区是如何被接受和发展起来的，以及他们在今天的亚洲又具有哪些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特有的不对应性：一方面我们这里恰好渐渐看到了批判理论在文化指向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目前亚洲则尤其关注着批判理论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方面。这个不对应性便促使我们做进一步思考，这是我来参加此次会议所乐意做的事。我觉得，我们之间在对待批判理论这个问题上的特有差异可以由三种彼此互启的方式得到解释。我提出来，供在座与会者进一步思考，哪一种可能会是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在今天的中国被接受的首先是老一代的思想。这一事实或许与此相关：《启蒙辩证法》中所分析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在中国是于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的，也就是说，由大众传媒而带来的越来越厉害的操控；对自我力量越来越强烈的消除以及在日常生活上对非理性主义悖论性的普遍回归。如果这个听上去不太可能的论断能站住脚，那么，紧接着就可以推断，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所披露的由现代化而带来的特定倒退和社会病症，对不同路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在今天的中国被接受的首先是老一代的思想这一事实或许也与此相关：该学派的经典著作在今天的中国被看成是欧洲文化遗产的一种，了解这样的遗产本身具有某种特定的价值。这也许正是该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使然，这样的色彩必然使它在亚洲地区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歌德的抒情诗一样被接受，也就是说作为外来文化宝藏被接受。这样，它就是由于自身价值的缘故而必须被接受和当下化。如果这个看法能站住脚，那么，紧接着就可以推断，批判理论的早期代表于此成了哲学经典，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披露或所拥有的对资本主义的



批判性题旨，而是因为他们思想的丰富文化内涵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第三，中国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关注或许体现了中国学术知识分子一个不良的自我误读，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被认为是具有澄明问题的威力而被接受，但在事实上它却并不真正掌握这样的力量。如果这第三个说法能站住脚，那么，紧接着就可以推断，当今中国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尔或本雅明的关注不经意地与中国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相关，这些问题是在当今中国强力推行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情况下出现的。

对于这三种解释中哪一种最具说服力的问题现在我不想做定论，但我希望我的中国同事们能告诉我们，批判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才勇 译)

导言：一个旅行的理论的挑战

〔德〕阿梅龙 (Iwo Amelung)

法兰克福和中国结下了一段久远的学术交流史。首先当然是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于 1925 年建立的作为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前身的中国学院。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早先也从事关于中国的社会研究。在此尤其要提到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他专门负责研究所关于中国的工作。魏特夫的博士论文——其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① 即脱胎于此——的第二导师就是卫礼贤。虽然与魏特夫存在全面的政治分歧，阿多诺在其去世前不久还是表达了对这一“关于中国的开创性工作”^② 的赞赏。

在出于政治压迫被迫离开德国之后，魏特夫随即借道美国造访了中国，在那里他不仅继续进行他的研究，而且认识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并不是很确定，魏特夫是否如其传记作者乌尔门所言曾在燕京大学（后来并入北京大学）任教。但确信无疑的是，魏特夫在中国逗留期间不仅利用此机会继续进行重要的研究，他还是第一个与社会研究所相关的，在中

① 魏特夫：《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个庞大的亚洲农业社会的经济分析尝试》，社会研究所文存第 3 卷。（Karl August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e einer groß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 Leipzig: C. L. Hirschfeld, 1931.）

② 转引自乌尔门《社会的科学：魏特夫生平与著作理解》，第 447 页以下。（Gary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New York: Mouton, 1978, p. 477.）



国引起关注的著名人士。而且他还很可能是第一个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社会研究所的同仁：最早的翻译之一是魏特夫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的一章，其最晚于1940年初以《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①为题刊登在中国的一本杂志上。

在魏特夫的原著中，这一章并不占据中心地位，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恰恰是这一章被翻译成了中文？在此，我并不能提供一个最终的答案，而只是想将对这一章的翻译看作中国的思想态度的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这一态度在1934年被著名作家鲁迅称为“拿来主义”。^② 鲁迅生活和工作于一个在中国简直被西方知识（包括来自苏联的革命的和列宁主义的知识）所淹没的年代。通过其对拿来主义与新知识打交道的方式所提出的要求，鲁迅希望能在他的同代人中创造一种批判的意识，它一方面能够克服当时仍广泛流传的对西方观念的怀疑主义，但另一方面也要能够遏止全盘接受的任意性。在鲁迅看来，只应该接受那些可能对中国有用的西方知识。因为关于自然科学传统在传统中国的缺失的讨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意义极其重大，所以魏特夫涉及这一论题的思想被视为更为重要的贡献。如果人们确信，自然科学没有产生是基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根源，那么清除这一根源自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了，魏特夫的观点在此恰好允诺了启蒙。

鲁迅的“拿来主义”向我们表明，西方知识的接受在中国一直具有工具的，因而是高度政治的功能。具有决定性意义、极其富有成效的是对政治思想的接受和应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其不仅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而且会有助于将中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水平，与西方并驾齐驱。

其他的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创伤的治疗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提上议程，同时出现的是寻找改头换面的、能够提供新的正当性资源的政治和精神模式。从90年代开始其主要涉及的是，一方面要为经济改革的成果寻找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答案，另一方面要发现一个有效的武器用以对抗自从接受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来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日渐显著的西方统治的细微形式。

在这一工作中尤其重要的是，努力让学术圈对某一理论感兴趣，并且

① 魏特夫：《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吴藻溪译，1944年10月1日《科学时报》。

② 鲁迅：《拿来主义》，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47页。

以与合作者一起对某特定理论进行学术交流的姿态出台，同时在此也可以看出一些学术上的类似自以为是的自我主张，努力将其塑造成对合作者而言某特定理论的最终阐释者并从中得益。与此相对的是“思想”视角，其具有显著的政治功能并因此也可以被译作“教条”或是“意识形态”。^①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其新的功能方面表现的是关于中国的批判反思以及对新的思维角色的塑造——一个尤其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的“忧患意识”的活动。在这一最早由在台湾活动的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忧患意识”的背后，也有——甚至可能主要是——中国的学者对其在国家中的角色的忧虑。从这一思维角色的忧患意识出发，中国知识分子有接近政府的义务，并应对共同的福祉作出贡献。^②对新知识的接受——比如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设想——因此总是与引起政府对这一知识的兴趣以及因此而强化自身或知识分子总体地位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这一努力要求对知识的接受进行再诠释。因此在思考哈贝马斯“公共性”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之时，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在诸基本条件比如教育和市民性尚未得到满足的农村领域，依据批判理论的观点来看，其参与决策的条件还不具备。那些以研究哈贝马斯为出发点的知识分子，试图充当一个帝师（Praeceptor Sinae）的角色，希望与党一起来对农民进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话语教育，由此来决定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资格扮演这一角色。

总的来看，基本上存在两种中国接受西方理论的不同功能：一是致力于通过西方理论去“改善”看起来好像不完美的中国；一是利用西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家作为对自己的知识与社会地位的确认与主张。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的思想话语中一再出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此所采取的折中主义。这里所介绍的分类的界限显然是流动的，并且在本书中两种操作方法的例子都有。

这一简短的评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觉得，好像这一接受过程发生在一个似乎无政府的空间内。事实恰好相反，这也是为什么与马克思主义的

^① 关于两者的区分可以参考戴维斯《忧患中国：中国的批判探索的语言》，第9~14页。（Gloria Davies, *Worrying about China: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14.）

^② 参见库尔兹《镜子背后的哲学：中国对哲学同一性的追寻》，载拉克内主编《在自我决定与自我主张之间：20与21世纪的东亚讨论》（新中国研究1），第222~238页。[Joachim Kurtz, "Philosophie hinter den Spiegeln: Chinas Suche nach einer philosophischen Identität", Michael Lackner (ed), *Zwischen Selbstbestimm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Ostasiatische Diskurse des 20. und 21. Jahrhunderts*, Baden Baden; Nomos, 2008, S. 222-238.]



观点紧密相关的法兰克福学派，即使是在政风比较紧的时期，也得以相对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中国而言——迄今依旧如此——“对错误行为的界定含混不清”。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安全与惩罚之间的界限，但他们至少知道，尽可能远离这一界限会更为安全。^①在此意义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基于它的马克思主义“基因”而在一个相比较而言确定的领域之内运动。其结果是一个从70年代末开始相对未中断的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持续研究。虽然在80年代末西方五六十年思想在一个五到六年的时间段内被引介给了中国读者^②，但造成法兰克福学派——最近几年尤其是以哈贝马斯的理论的形式——的持续影响的环境同样也可能存在，这一环境也为应对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而日益加剧的竞争而巩固其地位起了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更确切地说是批判理论，在其到达中国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在中国，它在一个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陌生环境里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因此——为了引用萨义德著名的“理论旅行”方案，几乎是必要地——“全然改变了自己的特点”。对此，萨义德赋予它失败的特征，因为它通过旅行失去了力量，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变成了“一个对真正的事物的学术替代品”。^③但是萨义德的断言并不正确。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由此也支持了我们的判断。许多年之后他写了一篇后续的文章，其中批判地研究了其与“理论旅行”相关的推论。颇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将自己与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联系起来。通过强调卢卡奇对阿多诺的影响，他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并且认识到了旅行对于一个理论之丰富性意义。“理论必须旅行，它必须始终运动，超越它的限制，它必须移居；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被放逐。”当萨义德宣称20世纪末——我想添加上21世纪初——的理智生活的真正任务是去研究一个理论在其旅途中已经到达了何方和如何在其旅途中重新点燃它的曾经炙热的内核时，他甚至走出了更远的一步。萨义德将对这一任务的劳作视作“提神的”，也就是令人振奋的和强身健

① 林克：《北京夜谈》，第178页以下。（Perry Link,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New York: Norton, 1992, p. 178.）

② 张隆溪：《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批判探索》1992年第19期，第107页。

③ 萨义德：《理论旅行》，载其《世界、文本与批判》，第226~247页。[Edward Said, “Traveling Theory”, E. Said (e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26-247.]

体的。^① 在这一背景下萨义德——虽然对阿多诺充满了敬佩，但他并不是批判理论的朋友——一定会为这本合集中的论文大为高兴。

这一对理论变迁的愉悦在中国与某种视角联系在一起，充满争议的文学史家夏志清（C. T. Hsia）将“执迷中国”同20世纪最初40年的文学家和作家的观念联系起来。夏志清认为，对那些著名人士来说，不以中国为对象的文学和知识分子题材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此外这些人还被爱国式的地方性以及一种幼稚的以为别处更好的观念所影响，并揣测“中国的条件应该被看作中国的特殊性”。^② 这一观察方式一直延续到当下并且与对中国的批判研究的日益纯粹的本土化要求联系起来。这一要求在拿来主义的意义作为对事实上的或是臆测的本土中国的讨论的强调中被神化了，其意义借助于从西方接受而来的知识凸显了出来。然而，这是近几年来，特别是在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下，认识到的一个清晰发展的事实。从这种视角出发，的确有一个事实存在的或是被宣称的西方话语霸权和由此推导出的自我东方化的过程，这两者导致了从19世纪末以来对西方知识的过于非批判的接受。从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启蒙思想”的传播要为中国20世纪以后某些经历而负主要责任。

这一本土化的倾向在针对某些在国外生活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指责声中到达第一高峰。那些人因非批判地应用西方理论，通过“他们对西方语法的掌握好像已经失去了说中文的能力”，而被指责为“混杂学问”。而他们对不相干的理论的强烈依赖与对中国现实的无知——也就是对中国缺乏“同情”——结合在一起就会造成“古怪”的后果。^③

现在或许可以推测，这一立场——它在理论上是如此的站不住脚，因为它就没有弄明白，一个可靠的中国话语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的——也需要好好去研究批判理论。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不少的知识分子运用过和正在运用批判理论并且主要是《启蒙辩证法》去批判启蒙，在他们

① 参考萨义德《理论旅行重述》，载其《反思放逐与其他论文》，第436~452页。[Edward Said, "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E. Said (e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36-452.]

② 夏志清：《执迷于中国：现代中国文学的道德负担》，载其《现代中国小说史》第2版，第533~609页。（C. T. Hsia,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33-609.）

③ 刘东：《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12期，第4~13页。（在此也关注到了混杂学问的问题。）

看来，“启蒙”借助其构成要素“理性”和“合理性”为“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自以为是的重要支持，而正是普世主义构成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那些希望在“启蒙”的帮助下索求诸如人权和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则通过后殖民的批判者去抵御批判理论的介入方式。但他们有时也表现得并不是很敏感，即当他们引用阿多诺的“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去谈论“文化霸权”？^①

新思维或新理论的接受除了这些明显可见的影响之外当然还有很多间接的、仿佛很隐蔽的后果。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比较典型的是关于中国的科学主义及科学和技术在当代中国的地位的讨论。虽然两者在当下的中国都拥有极其明显的积极内涵，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科学主义观点的批判研究。原因之一就是20年代初科学与玄学之争之后的科学信仰的第一阶段的重估，这一重估由郭颖颐（D. W. Y. Kwok）的《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00~1950》的翻译所激发。^②第二个原因可以在中国日益明显的技术专家治国的调整中找到，这一调整伴随着一个科学普及化，但也用来反对民族宗教的“封建迷信”和被视作异端的学说。显而易见的是，至少有一部分“批判的”知识分子带着怀疑看待这一发展。除此之外——即使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对科学和技术及其压迫性的现象的解释和评价中，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尤其是对哈贝马斯的接受有着极为显著的意义。^③比较特别的是，科学与技术以及科学化技术的目的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这一问题在中国的接受中仅仅处于附属的地位，一如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的两篇文章所指出来的。

这些简短的说明应该已经足以提醒我们，中国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层次的。特别需要去批判地研究的是，在出发点的理论和经过

-
- ① 雷颐：《今天非常法兰克福——对一种“理论透支”的分析》，载其《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273页。
- ② 郭颖颐：《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00~1950》（耶鲁历史出版物82），第一个中译本出现在1989年。（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③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和社会理论》，载戴维斯主编《表达关注：当代中国的批判探索》，第135~156页。[Wang Hui, “On Scientism and Social Theory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Gloria Davies (ed.), *Voicing Concerns: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 Lanham: Rowman&Littlefield, 2001, pp. 135-156.]

了漫长的——并且绝非总是直接的——旅途之后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去确证这一在萨义德意义上令人振奋的旅行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一“本土化”的压力造成了批判理论的调整和转化，其影响和意义若无谨慎和批判的分析是绝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将这一意义的转变评价为简单的误解对这一接受过程的复杂性而言是不恰当的。同样复杂的还有中国的现实和自以为是的分析的描述，以及可归功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之间的关系。在其背后一方面是批判理论的普遍性问题，而另一方面主要是对中国当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问题进行描述的问题，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其应该被描述为显著“政治的”并且理所当然地依据政治立场的不同而进行全然不同的处理。处于这一关系中的还有，为中国所接受的批判理论的含义和政治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动力学问题。在那些将对中国的批判话语的贡献追溯到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言论的知识分子那里，会涉及在中国一再让人期待但同时又绝对令人害怕的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吗？戴维斯和冈茨（Natascha Gentz）已经在“哈贝马斯案例”中将这一通过不同的学术和思想学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者占为已有的复杂化情况典范性地展示了出来，这一案例在北约的支持下发生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

当前的这本册子的目的在于，通过在广泛意义上追随法兰克福学派思维传统的学者间创造对话，随同中国的接受者和观察者——如果人们愿意在这一关系中这样描述汉学的地位的话——一起进入批判研究的新层次，我们希望这一研究至少能够为东西对话的批判关系的澄清作出小小的贡献。

（阿梅龙 译）

目录

CONTENTS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 开幕致辞 [德] 霍耐特 / 1
导言：一个旅行的理论的挑战 [德] 阿梅龙 / 1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东亚的历史

接纳过程中的比较问题

- 对跨文化理解的思考 [德] 马丁·米勒 / 3

跨文化批判：中国现代性对批判理论的挑战 [德] 何乏笔 / 12

接受与拒斥

- 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傅永军 / 29

批判理论的效果历史

-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台湾的接受史 曾庆豹 / 38

批判理论与东亚经验视角下的传统概念 [日] 三岛宪一 / 51

市民社会讨论和批判主义理论在韩国的现况 [韩] 全圣佑 / 67

启蒙和批判之间的现代中国

一个世界：论旧批判理论的普遍性

- [德] 亚力斯·德米罗维克 / 77

《启蒙辩证法》与中国虚无主义 刘森林 / 87

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话语与范式 韩水法 / 101
当代中国的科学主义与科学传播 吴国盛 / 124

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辩护关系之批判

——关于政治批判理论 [德] 莱纳·福斯特 / 133

本土化视角下的哈贝马斯

——从中国政治改革论争看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 [德] 苏娜 / 143

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 童世骏 / 158

一种中国特色的农村公共领域是否可能 曹卫东 / 171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和艺术理论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和美学 [德] 卜松山 / 185

本雅明对当今中国的意义 王才勇 / 197

革命与欲望

——中国的“性解放”与法兰克福学派 [德] 狄安涅 / 201

性与女性自主

——中国新旧媒体中匿名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 翟振明 / 217

文化工业理论的重建 黄圣哲 / 226

哈贝马斯——传媒哲学在公开理性使用中的废除

..... [德] 史蒂芬·米勒-多姆 / 241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理论在东亚的历史
